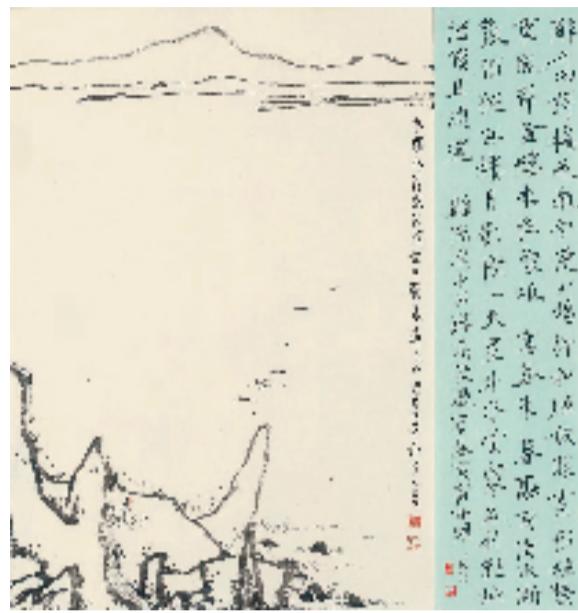


我和西湖画会

■金心明



金心明 水深水浅东西润

2013年的深秋,我小时候的玩伴何关明和朱文辉相约我们几位同人去黄山写生。那时关明的企业正好落户在池州,顺道也去秋浦江呆了几天。同行的有章耀、陈经、余久一、凌中翔和我,中途柳青凯也从北京来加入写生活动。此行游兴意浓,于是回杭后的第二年在恒庐做了一个展览,名为“甚处得来——五画家黄山写生展”。

缘于此,大伙计议组织一个小团体,因为在杭州,索性就叫“西湖画会”。再加上原来午社的同人吴涧风六个人,在满觉陇的石屋洞吃了顿饭,商议了一些事情,制

订了近期的一些规划,这事就算成了。参与具体画会事务的是朱德朋的团队,什么设计呀、出版呀、展览呀、宣传呀、联络呀,都是他们做,有声有色,办了会刊《西湖画丛》,收藏鉴赏刊物《金石书画》,活动刊物《西湖画报》,一时间南北画人相聚湖上,着实热闹。满觉陇那幢小小的楼房里,展览、雅集、培训、茶会,俨然一个艺术中心的样子。

创建初期,六个人都做了很多的奉献,无偿地画了很多画,换了钱办事情,如此这般忙了些年。再后来,慢慢地又有点疲了,热情也没有原先高了,场地也维持不下去了,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。我也在这期间做了一个“意在山林”的山水画研习班,聚了一帮年轻的爱好山水画的人,教学相长,似乎在这中间自己也得到了一些认知上的改变。办了三期,有几十号人,办学地点也从满觉陇开始,到北山路,再到九里松,也是学习、创作、展览、出版、交流,还是朱德朋的团队做的,成效似乎也可以,在整个大环境不利于艺术发展的情况下,聊以自慰吧。

三年疫情之前,西湖画会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固定场所,之江的“寓山美术馆”。尽管不在西湖边,那个地方原来的名字叫“西湖墅”,或许是缘分吧,冥冥中与画会结合在了一起。“意在山林”的诸位同仁也参与到一起来,章旭、兆一、黄庶、吴沈生、杨晓静、秦舟、张东伟等等,张罗一些活动,诸如微拍、展览,还有培训,一直到疫情的蔓延,才稍作停顿。

疫情后章旭在雁庐做了“山有阙”的山水画展,邀约了与画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师友共同参展,见证了他成

为画会的新成员。共同的旨趣和追求是大家踽踽前行的基础,相知相伴,嘤嘤以求,越到年纪大起来,越能感觉到同仁知己的可贵。

倏忽间,十年过去了,我们的脚步在渐渐地放慢,需要细细体悟的东西越来越多。明雍是我的大学同学,生性散淡,从学校的老师到画院的画师,再到画院的院长,自然而然地生长在临平黄鹤山下。尽管从午社起都在一起玩,一起做事,可从来没有想到过融入到画会的群体中来,可以说明雍一直是我们画会的同行人,这次在寓山的小展,说白了是特意为明雍办的,正式地把老朋友纳入到一起来,真是一件美事、好事。

古人说“君子不党”。我们的“西湖画会”多少也算是一个同人结社的行为,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,虽然也在努力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,但作为一个社会人,作为一个修为不高的离君子还有差距的普通人,我们需要温暖,需要关怀,需要朋友,需要知己,以释心中诸多的疑虑。或许这也是一个过程,人与人也是随缘聚散,无从强求。画会虽然是一个会,其实只不过是名字叫“会”而已,没有实质的东西,没有具体可操作的规范,像风像云,自从来。做成一个有形的东西其实不难,难在不可言说的自在安宁。

西湖画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。十年是一个时间的概念,再十年,再再十年,或许就是变而为一个长长的概念了。

(作者系浙江省书法研究会副主席、浙江省中国画创作研究所所长)

人民画家库尔贝

■徐鹏辉



库尔贝 奥尔南的葬礼

19世纪的法国正值政治动荡、思想繁荣时期,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在艺术上争雄,全欧洲人民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文化之都。不同绘画流派的交锋产生众多超越时代的作品,如浪漫主义画派席里柯的《梅杜莎之筏》,新古典主义画派达维特的《马拉之死》等。令人惊讶的是,在盛行的美术派别之外,有位画家仅凭一人之力将现实主义画派带上历史舞台,他对绘画别具一格的见解更是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印象派画家,直至今天仍意义非凡。

作为现实主义画派创始人,居斯塔夫·库尔贝注重绘画对真实生活和风景的展现,推崇画家对周遭环境的体验。他曾对自己的艺术理念作出阐释“我希望永远用我的艺术维持我的生计,一丝一毫也不偏离我的原则,一时一刻也不违背我的良心,一分一寸也不画仅仅取悦于人、易于出售的东西”。库尔贝所说的原则就是真实,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坚持真实是那么的难能可贵,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他执着的内心与不羁的追求。

追溯库尔贝的成长环境,我们能更好理解他的艺术源泉。库尔贝出生于法国东部奥尔南的一个富裕农家,他的父亲是家底颇丰的农场主,母亲是出生于法律世家

的通情达理的农妇,四个妹妹充当了库贝尔画作的模特。风景如画、气候宜人的奥尔南小镇在库贝尔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,树林、小溪、乡邻也成为他不断创作的主题。拗不过父亲的意愿,库尔贝前往巴黎的大学学习法律。在名落孙山后,库尔贝立志成为一名画家,父亲也只好默认他的愿望。在巴黎的日子是无比充实的,库尔贝常常去卢浮宫临摹大师画作,为后来的名声大振奠定基础。

1844年,库尔贝的作品《带黑狗的自画像》第一次被沙龙展接受,他开始在画坛拥有一席之地。《带黑狗的自画像》中,库尔贝以微微扬起的脸庞面向正前方,眼神里满是天真、自信及戏谑,黑色的帽檐和卷曲的长发将他的脸完整框住,拥有丝滑皮毛的黑狗安静地待在一旁,轻松愉悦的神情和主人如出一辙。在远处亮丽风景的衬托下,山谷中的他和狗显得尤为突出,手杖和书籍放置于画面左侧,凸显出浓郁的个人色彩。从画作痕迹来看,库尔贝首次使用刮刀来涂抹颜料,这也成为日后他的画作特征之一。除了这幅画,库尔贝在艺术生涯里创作了不计其数的自画像,有抱头瞪眼的《绝望的人》,还

有眼神迷离、姿态安逸的《抽烟斗的自画像》。人们对此常常评价为库尔贝的极度自恋,用来证明他的潇洒放荡,也有人分析指出,众多的自像是库尔贝在那个动荡年代疏解内心情绪的方式,恰恰证明了他对社会和人民的关切和担忧。

成功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,1855年的万国博览会上审查委员会接受了他的11张画,但是拒绝了《画室》和《奥尔南的葬礼》。倔强到骨子里的库尔贝干脆在博览会附近搭建小棚子,举办名为“现实主义:库尔贝的40件作品”。他对传统的勇敢宣战激励了一大批青年画家,库尔贝也由此一战成名。《奥尔南的葬礼》将目光投向农村葬礼的场景,以鸟瞰式、全景式构图方式展现真实的人物形象。库尔贝用深色调配以白色、红色完成了画面建构,上方是高原地平线和岩石坡。画面左侧是神父、官员和唱诗班的少年,中间是市长、老兵等送葬人员,右侧是老幼妇孺哀悼者和一只小狗。人们的脸上没有夸张的悲伤,有的是例行公事的哀悼,集中表现为服丧女人拿着白手帕擦拭泪痕。画面中没有所谓英雄的宏大叙事,有的只是普通人的生与死,所有人们将这幅画评价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,小人物的真实感震撼人心,类似的画作还有《奥尔南的晚餐后》。

库尔贝同样是风景画的高手,以《雷雨后的艾特达断崖》为例,天边层次分明的晚霞和光线质感出色,暴雨过后的岩石、沙滩、天空和海洋显得那样清澈迷人,断崖仿佛沐浴过后显露出线条分明的躯体,画面近处的渔船同样完美融入画作。正是库尔贝对大自然细节的真实呈现,赋予了风景非同寻常的美丽。

艺术是社会变革的先声,库尔贝的一生与政治事件紧密相连,使他的画作不知不觉中记录和传递着历史。受“旺多姆圆柱事件”的牵连,库尔贝被迫远离故土、流亡瑞士。由于无法解决诉讼和债务问题,库尔贝对生活充满了担忧,最终因水肿病在瑞士逝世。回望库尔贝追求真实、追求自由的一生,或许只有想到故乡的风、云、水、树、人,他才能放松绷紧的神经,回到最无忧无虑的平和状态。

(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)